

四魔现形记

7.4
2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四魔现形记

(二)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5 字数: 49千字

1978年8月第1版 1978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册

书号: 3088·187 定价: 0.18元

目 录

第二十六回	揭老底黑帮露本相 剥画皮四害现原形	1
第二十七回	三代官僚地主衣钵相传 张家恶少坏种欺压穷人	6
第二十八回	充当特务猖狂围攻鲁迅 隐瞒历史伺机潜入延安	12
第二十九回	李狼贼剥削致富 闹小姐凶恶成性	18
第三十回	卑躬屈膝云古自首叛党 献媚取宠蓝苹效忠蒋匪	22
第三十一回	徐恩曾一眼相中纨袴千儿 姚文元竭力包庇反动老子	27
第三十二回	两面派要尽鬼蜮伎俩 变色龙万变不离其宗	33
第三十三回	欺世盗名打工农兵招牌 死心踏地走反革命道路	40

第三十四回	投机造反新工贼发迹 野心勃勃大流氓篡权	46
第三十五回	相互包庇掩不住罪证 杀人灭口抹不掉丑行	50
第三十六回	穷奢极欲吸血鬼 荒淫无度寄生虫	56
第三十七回	贪污盗窃鲸吞国家财富 花天酒地挥霍人民血汗	61
第三十八回	倒行逆施与人民为敌 恶贯满盈被人民打倒	69

第二十六回

揭老底黑帮露本相 剥画皮四害现原形

话说王张江姚“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恨不得一个巴掌把我们的党和人民打翻在地，一口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吞下肚去。前几年，在那“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广大革命人民总是在想：王张江姚究竟是一伙什么东西？他们为什么那样狼狈为奸，仇恨革命？为什么那样疯狂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为什么那样为非作歹，祸国殃民？现在，剥去他们的伪装，翻开他们的老底，弄清他们的来历，真相完全大白了！大量确凿的事实证明，王张江姚“四人帮”，是由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党集团。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王张江姚结成反革命黑帮，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早在三十年代初上中学时，就充当了国民党特务，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密告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此后，又在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派遣下，伺机混入延安，隐瞒了他的反革命历史和反革命家庭和社会关系，钻进了共产党。大老板江青，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

庭，早在三十年代就开始了反革命政治生涯。她靠着投机钻营和伪装进步，先是削尖脑袋混进共产党，不久失去了党的关系，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时间不长就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自首叛变，成了可耻的叛徒。后来，她与另一个女叛徒订立攻守同盟，混入延安，钻进党内。文痞姚文元，不仅出身于地主兼资本家家庭，是叛徒、特务姚蓬子的儿子，而且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干儿子。长期以来，他坚持反动阶级立场，包庇其叛徒、特务老子，大耍反革命两面派，写了许多毒草黑文，完全是个阶级异己分子。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丑恶历史说明，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就是他们走过的全部道路。至于那个“暴发户”王洪文，虽然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但是一贯好逸恶劳，表现不好，品质恶劣。文化大革命前，他经常和一些四类分子打得火热，称兄道弟，吃喝玩乐，文化大革命中，他投机“造反”，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勾结到一起后，资产阶级野心恶性膨胀，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走上了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他大量贪污盗窃，挥霍国家钱财，过着花天酒地、腐朽糜烂的生活，完全变成了吸劳动人民血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所谓“四人帮”，就是由这伙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结成的黑帮。

这伙反革命黑帮互相勾结，由来已久。早在三十年代，张春桥和江青就都和一个名叫崔万秋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来往频繁，关系密切。当时，崔万秋是反动报纸《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原来就充当国民党特务的张春桥，在崔万

秋的指使下，经常炮制反动文章，配合蒋介石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军事“围剿”，积极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在同一时期，那个从狗洞里爬出来的江青，也结识了国民党特务分子崔万秋，彼此往来，互相利用。据此可知，张春桥和江青结成反革命黑帮，早有来历，不是偶然的。几十年来，他们干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想干而干不成的事情。他们现行的反革命活动，就是历史反革命活动的继续和发展。

再说那个文痞姚文元，也和张春桥早有勾结。还在五十年代初期，姚文元就继承其叛徒、特务老子姚蓬子的衣钵，舞文弄墨，醉心写作。但由于立场反动，心术不正，水平低劣，并未一鸣惊人，引起人们注意。正当姚文痞苦恼功不成、名不就的时候，恰被当时窃踞上海文化宣传系统领导职位的张春桥一眼看中，认为是个“有用之才”，遂把他调到文艺刊物《萌芽》杂志当了编委。张春桥对于姚文元的出身根底，是非常清楚的。从此以后，便对姚文元倍加“关照”，用心“栽培”，极力“提携”，既帮助姚文元在党内攫取职位，又让他“超脱”事务，专心致志地研究所谓“理论”。由于反革命的志同道合，这两个家伙便勾结一起，沆瀣一气，结成了一对帮派兄弟。

王张江姚“四人帮”，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一九六六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些家伙认为他们篡党夺权，“改朝换代”的机会来了，便一齐跳了出来，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张春桥就一头栽到那个一心想当“女皇”的江青怀里，把江青作为靠山，充当了江青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厚颜无耻地说：“人家说我们拍江青的马屁，

这个马屁就是要拍，这个马屁拍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又拉上姚文痞，更加起劲地为江青吹喇叭，抬轿子，说什么江青是“高举红旗的旗手”，“对江青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听江青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等等。这江青也立即给张、姚报之以赏，吹张春桥“是我们党的少壮派”，封姚文元“是革命的金棍子”。一九六七年一月前后，王洪文在上海投机“造反”后，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便一眼瞅上了这个流氓和工贼，给他戴上了“工人运动的领袖”、“一月风暴的英雄”等桂冠。从此，这个流氓、工贼便发迹了。王洪文紧紧抱住张江姚的大腿，说什么：“我们新干部的命运，是和中央三位首长（即张江姚）联系在一起的”。一九六八年四月，当上海街上贴出反对张春桥的大标语后，王洪文召集他的“小兄弟”开会密谋反扑，在会上狂叫：“没有张春桥，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打倒了张春桥，我就是黑爪牙，我的态度是明朗的——死保！”由于共同的反动阶级本性，共同的篡党夺权的野心，这四个家伙便串在一条反革命的黑线上，紧紧地抱在一起，结成了反革命的黑帮。他们打着“左派”、“造反派”的旗号，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一呼三应，你拉我拽，扶摇直上，混进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窃取了重要的领导职务，成为隐藏在党中央的、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王张江姚结帮以后，还到处培植亲信，网罗爪牙，发展帮派势力。他们继承了当年蒋介石在上海搞青红帮的衣钵，仿效林彪培养周宇驰、于新野死党的伎俩，从中央到地方，经营了一个有纲领、有路线、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

他们有帮中央，有大老板，有军师，有司令，有宣传部长，有舆论工具，有情报系统，有基地，有特务联络据点。他们打着支持所谓“造反派”“反潮流”的幌子，收拢了一大批新老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卖身投靠的所谓老干部、出卖灵魂的无耻文人、打小报告和告黑状的投机分子、牛鬼蛇神、流氓阿飞、社会渣滓。他们结帮营私，以帮代党，以帮乱党，以帮篡党。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我们党受其害，国受其害，民受其害。他们是党和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齐都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虽然在党内隐藏得很深很久，他们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尽管也经营了不少年，但是由于坏事做绝，人心丧尽，终于被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一举粉碎，彻底覆灭了！猖獗一时的“四人帮”已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他们将永远作为革命人民的反面教员，遗臭万年！

第二十七回

三代官僚地主衣钵相传 张家恶少坏种欺压穷人

“四人帮”反党集团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王洪文，人人都有一部丑恶的反革命历史。这里先从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血债累累的三代地主官僚世家说起。

一九七二年的一天，有个山东老头千里迢迢跑到上海，寻找他的侄儿。这人贼头贼脑，但说话的口气确是惊人，说他的侄儿，就是当时上海的头号人物张春桥！——原来，这老头是张春桥的堂叔，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因看到张春桥“威赫赫，爵位高登”，便特地从山东老家巨野县跑到上海，找他的侄儿认亲。不料，满心欢喜见侄儿的叔叔，却当头吃了侄儿一闷棍：不认！不但不认，还把老头关起来，住了一个多月的“学习班”。“学习班”的负责人对老头谈话时说：同名同姓的人很多，不要妄自攀亲！随后，便派两个人把老头押回山东原籍，并对当地有关部门说：上海的张春桥根本不是山东巨野人！

张春桥翻脸不认叔叔，原因是生怕兜了他的老底。为此，他先后三次派人偷偷溜到山东巨野，以“访问”为名，找那些了解张春桥底细的老贫农、老干部“谈话”，软硬兼施，不准这些人透露张春桥的家世真情，并且恫吓：说张春

桥是巨野人，是“诬陷中央首长”的“政治谣言”！

其实，造谣撒谎的不是别人，正是张春桥自己。张春桥小名“善宝”，于一九一七年出生在山东巨野县城内西街一个三代官僚地主家庭里。张春桥的曾祖父张在文，在清朝先任巨野县衙状班总役（人称“老总”），后任征收田赋的八柜柜书，勾结官府，包揽诉讼，索要钱粮，横行乡里，人称“二眼镜”。张春桥的祖父张协忠，在清朝袭任了八柜柜书，后任国民党巨野县政府钱粮征收处主任，还当过日伪汉奸维持会主任，敲榨勒索，为非作歹，罪行累累。张春桥的父亲张开益，在山东军阀张宗昌的手下当过高苑县邮政局长；国民党统治时期，当过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少校军医、山东省会公安局柄流所所长；日寇侵占山东后，任伪济南警察局卫生科庶务主任、山东保安三团军医主任；日本投降后又摇身一变，当了国民党济南市戒烟院院长，是个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张春桥的主要亲属中，有二十二人出身于反动官僚、地主和富农家庭。这帮吸血鬼，上结反动官府，下通地痞流氓，横征暴敛，广置产业，外有高官厚禄，内有万贯家财。巨野县解放前三年，张春桥家里仍有房屋二十二间，院前有菜园，院后有花园，连宅基地共四千一百多平方米；全家六口人，雇着四个佣人侍候，拥有土地八十五亩九分，全部租给贫苦农民，按六至七成收租。张春桥家不仅靠土地剥削贫苦农民，而且还出租房屋，放高利贷。直到一九五五年，他的狗父张开益还收房租。

张春桥家祖上三代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他家土地租给佃户，打下粮食，每亩必须先扣掉十二斤种子粮，一斤半“看坡粮”，剩下的再三七开，三分归佃户，七分归张

家。他家还规定，交租的粮食不晒干不要，不扬净不要，成色不好不要，并且还必须把粮食运到他家，倒进囤子里。每年外借种子时，张家又高利盘剥，借一斤秋后要还四斤。

交了地主粮，佃户饿断肠。老贫农单克奇在解放前祖孙三代给张春桥家当了三十多年佃户。单克奇和张家虽是姑表亲，可是由于阶级不同，张春桥家姓“富”，花天酒地，单克奇家姓“穷”，忍饥受冻。那时，单克奇租种张家二十九亩半地，牲畜、农具、劳力全是老单家的，收的粮食除去种子和看坡粮以外，地主张家拿去两份，佃户单家只得一份。单克奇把粮食晒干扬净，送到张春桥家时，连口水也不给喝。这还不算，张春桥家还强迫单克奇在炎热的夏天到四十里外的地方给推运租粮，连一点路费都不给。单克奇就这样整年累死累活，到头来仍然还不清张家的阎王债，一家人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一次，单克奇去张家还债，进家后把钱放在桌子上，张春桥的祖父张协忠这个老狐狸清点时，偷偷地把三块银元丢在桌子底下，然后把狗眼一瞪，硬说单克奇没还够钱，逼着承认还欠他三块钱。有一年正赶上青黄不接，连野菜也没处挖，单克奇的小儿子出天花躺在床上不能动，小女儿也眼巴巴就要饿死。老单无奈，只好又到张家借粮。张协忠破口大骂说：“你这穷酸，我没有给你搁着粮食，快给我滚出去！”就这样，单克奇三岁的小女儿在讨饭路上活活饿死。小儿子在家出天花，发高烧无钱医治，也活活病死。还有个穷人王秀业，年轻力壮时就给张家当杂役，受苦受累三十年，最后被榨干了血汗累弯了腰，惨死在杂役棚里。有张春桥家那样的狗财主当道，哪里还有穷人的活路！

老贫农贾莲阁，十三岁上被张春桥家用五吊钱买去当了丫环。进了张家门，如入虎狼穴。她吃的是残羹剩饭，出的是牛马苦力。除了照看好张春桥和他的弟弟外，还要给张春桥的狗娘端尿盆，送茶饭，以及涮锅、洗碗、打水、扫院、洗衣物，样样得干。贾莲阁每天起五更睡半夜，累得死去活来，稍不如意，就得挨骂挨打。有一年腊月，下了一场封门大雪，第二天天不亮，张春桥的狗娘就逼着贾莲阁上房扫雪。房高她上不去，地主婆硬叫人把她拖上房去。四进院子几十间房，整整扫了一天才完。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贾莲阁穿着破衣烂鞋，手脚冻肿了，脸冻破了，几次想下房暖一暖身子，都被地主婆臭骂一顿，不许她下来。张春桥兄弟及其狗娘望着贾莲阁穿的破衣烂衫、瑟瑟打颤的情景，在一旁狞笑取乐。又有一次，张春桥的狗娘诬赖贾莲阁偷了她家三千钱，用笤帚疙瘩劈头盖脑地打。贾莲阁不仅被打得鼻口流血，而且白天罚干重活，夜里跪在床前，一连三天，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还有一次，张春桥的狗娘让贾莲阁给张春桥姥娘家送东西，贾莲阁路过自己家里顺便看看娘，地主婆子知道后，便抓住她的头发，按到地下，狠狠毒打了一顿。张春桥的狗娘虐待贾莲阁，就象《白毛女》里黄世仁的狗娘虐待喜儿一样。真是黄鼠狼不嫌小鸡瘦，狗地主心比蛇蝎毒！

在罪恶的地主家庭里，张春桥从小就是一个坏种，人称“恶大少”。这个地主崽子呱呱坠地后，就有奶妈、丫环和佣人侍候，一直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生活。平时，对丫环、佃户，他张口就骂，举手就打，百般虐待和欺凌。有一年，佃户单克奇的小儿子和小女儿去张家大院捋槐花吃，刚进二门，张春桥就唤出恶狗向两个小孩扑

去，小女孩的衣服被撕破，腿被咬得鲜血直流。张春桥站在一旁恶狠狠地说：“穷种，咬死也不多！再来还要唤狗咬！”张春桥在私塾学堂念书时，每次都要仅比他大四岁的贾莲阁来回背着。狗崽子养得肥头大耳，路程又远，每背一趟就累得贾莲阁上气不接下气。稍不随意，张春桥就对她拳打脚踢。张春桥在高苑县上学时，洋服口袋里装的是东洋玩具和糕点。他对穷孩子非打即骂，任意欺侮。就连他的狗名也不能叫。一次，穷孩子孔庆占因为叫了他一声“善宝”，就遭到残酷的处罚和毒打。孔庆占因此患了一场大病，以后再也进不了这个学校的门。张春桥从小就野心勃勃，想当大官。在他念小学时，别人看他紧闭双眼摇头晃脑背书的丑态，开玩笑说：“你这样用功，长大了还想当韩复榘（国民党山东军阀）？”他一本正经地说：“我还想管几个韩复榘哩！”

几十年来，张春桥对其反革命家庭和社会关系，讳莫如深，千方百计地隐瞒，欺骗党和人民。一九三八年，他刚混入延安时，说他出身“中农”；一九四四年，又说“应填城市小资产阶级”；一九七三年，在填写党的十大《代表名册》时，又改为什么“自由职业者”。张春桥对其反动官僚、汉奸父亲的罪恶历史，也是一再隐瞒包庇。开始说他父亲是“小职员”，继则说“是一个一生不得志的知识分子”，以后又说是个“医生”。一九四七年济南刚解放时，张春桥匆匆忙忙以《石家庄日报》社长的身份，在济南《新民主报》上登了一个《寻人启事》说：“父张开益，字晋青，事变前在市公安局卫生科作事，日寇占领时去青州开医院，日寇投降后回济作医生”，云云，妄图以这个《寻人启事》，继续隐瞒其父亲反革命的政治面目。一九六一年，张春桥把

他的反革命父亲和地主婆母亲接到上海保护起来，逃避群众对他们的监督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还利用职权，派人到公安机关，阴谋索取他父亲的档案材料。第一次没有得逞。张春桥又派人穿上军装，打着上级机关的旗号，“名正言顺”地要走了他父亲的档案材料。事后，张春桥对那些曾经接触过其父档案的革命干部，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进行隔离审查，拘留关押，有的干部和群众甚至被折磨致残。广大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揭了一下张春桥的老底后，他又怕又恨，残酷镇压，就连他是“巨野人”都不准别人提！但是，张春桥及其反动家庭的罪恶历史铁证如山。尽管他采用种种卑劣的手法长期隐瞒，结果是：欲盖弥彰，枉费心机，弄巧成拙，自取灭亡。

第二十八回

充当特务猖狂围攻鲁迅 隐瞒历史伺机潜入延安

地主恶少张春桥从小就是一个欺压穷人，作恶多端的坏种。他从根子上坏起，往后越长越孬。他经过反动官僚地主家庭的熏陶，又在巨野县私塾学堂里受到了孔孟之道的启蒙教育，怀着一颗长大了要“管几个韩复榘”的野心，於一九三一年随其反动官僚、汉奸父亲张开益，由老家巨野县到了济南。次年，到济南正谊中学读书。从此，年仅十五、六岁的张春桥，便开始了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生涯。

当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正谊中学的进步师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在进步学生程鸣汉、鹿效曾、郑庆拙等人的领导下，进行罢课、游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学潮。国民党反动派便委派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陈果夫的亲信徐伯璞去该校任校长，镇压学生运动。一九三三年，在正谊中学的一次周会上，徐伯璞鼓吹“读书救国”的反动论调，妄图把学生引入歧途。这时，进步学生鹿效曾冲上讲台，当场揭露徐伯璞破坏抗日救国运动的罪行，并提出立即赶走徐伯璞。台下学生一呼百

应，高喊革命口号，大量散发革命传单，徐伯璞既恨又怕，束手无策。事后，伪装积极、混在学生运动中的张春桥，觉得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立功的时机已到，便偷偷跑到徐伯璞面前，密告了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程鸣汉、鹿效曾、郑庆拙等人的情况。徐伯璞立即向伪教育厅作了报告。接着以“煽动罢课、污辱师长”为借口，将张春桥密告的六名学生开除出校。同时，徐伯璞又将程鸣汉等人的活动情况报告给伪法院法官胡性孽，要他们严加惩处。不久，反动当局便以共党分子名义逮捕了程鸣汉，在审讯中严刑拷打，判处无期徒刑，后来牺牲在狱中。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对抗共产党，镇压抗日爱国运动，在蒋介石亲自导演下，成立了一个法西斯特务组织——复兴社。它到处网罗、培植爪牙，竭力把魔爪伸到各个角落。一九三三年春，国民党山东复兴社的头目之一、原正谊中学训育员黄僖棠授意复兴社特务李树慈，与张春桥、马吉峰等人秘密策划，发起成立了华蒂社。张春桥一开始就参加了华蒂社的筹建活动，就连“华蒂”这个名称也是他参与研究确定的，“华蒂”，就是“中华法西斯蒂”的意思。开始，华蒂社在国民党报纸《厉下新闻》副刊上出版《华蒂》周刊，后来由复兴社出资创办了《华蒂》月刊。张春桥不仅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而且是它的“中坚”分子。他极力拉拢诱惑青年学生，为华蒂社发展组织，介绍了陈庆璋等人参加华蒂社；同时，积极为《华蒂》周刊、月刊和国民党反动报刊撰写反动文章，积极拥蒋反共。此外，他还亲自拿着《华蒂》刊物到各学校兜售，借机探听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的情况，为国民党复兴社提供情报。为此，复